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 东正教精神 与俄罗斯文学

刘 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语言文学类

# 东正教精神 与俄罗斯文学

刘 锐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 / 刘锐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俄罗斯人文精神与文学)

ISBN 978 - 7 - 02 - 006806 - 7

I . 东… II . 刘… III . 东正教 - 影响 - 文学 - 俄罗斯  
IV . B976.2 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361 号

责任编辑: 刘开华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张文芳

##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

刘锐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02 - 006806 - 7

定价 2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序　　言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这首先是一个文学的文化研究题目。初一见到这个题目，会令人感到好像大了些。不过如果考虑到世界文学批评的流向和语境，考虑到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化危机，就会让人认识到，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一个关注人类精神产品的价值释义的人，不应该放弃从宗教文化视角对俄罗斯文学这一享有人类精神文化最高成就的艺术景观进行描绘的尝试。本研究成果旨在对俄罗斯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解读，揭示俄罗斯文学文本以及作家的思想观念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的有机联系。

艺术总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是一种文化的意义载体，对于文学来说，也是如此。文学艺术总是处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变化之中，即文化艺术学中所说的文化场，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也是处在这样的文化场中，因此在研究中不能孤立地从东正教文化和教义观念出发，而是要综合考虑社会政治因素、经济所有制关系因素和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等，这要求我们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文化哲学观念。20世纪下半期，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从文化场的角度考察文学艺术，从各民族文学艺术中反观人类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和一个热点。西方对艺术的文化研究方面理论著述颇丰，论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专著不胜枚举，成为继20世纪40—50年代注重绝对文本自足性价值的英美新批评之后又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学批评图景，堪称是对新批评的一种超越和反驳。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能够达到今天的高峰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首先，其优点在于它能够把艺术看做人类精神产品的集合，能够从人类生活、社会心理、历史的各个侧面把对艺术的精神价值的阐释推到一种极致；同时，可以为区分不同民族文学艺术提供一个最本质的参照系，因而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思路和前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和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必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从突出文

化价值的意义上,甚至有人说,一种民族文化是文学艺术的灵魂。由此,文化批评也成为认识文学艺术的一种最佳思维范式;从现实的角度看,关注文学的文化意义有助于对抗现实生活中物欲和精神生活的矛盾,关注和解释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关怀现实的品格、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而受到人们的认可,因此有人预言,这种文学批评的文化意识和视野的前程将是无可限量的。俄罗斯文学浩如烟海、博大精深,东正教精神文化构成复杂、内容庞杂,笔者深知做这样一个题目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理清一些关系,对于确立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是尤其重要的。

苏联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形成以卡冈( М. С. Каган )为代表的在文化系统中研究艺术的美学思想流派,代表了近代俄罗斯文学审美批评的一种传统。20 世纪 70 年代初,巴赫金( М. Бахтин )对于文化与文学研究也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语境是无法理解的。”<sup>①</sup>

文学现象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心理的综合体现和升华,但是又不能把文学现象封闭在它所产生的时代里,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是植根于遥远的过去。正如巴赫金所说的,伟大的作品都经过若干世纪的酝酿,到了创作它的时代,收获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熟过程的果实而已。“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的界限,生活在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的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将永远是)比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sup>②</sup>“如果作品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汲取了以往世纪的东西,那它就不能在未来的世纪里生存。它们在其身后的生存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意义、新的含义;而这种伟大的作品不是因人们对它的现代化的歪曲变得强大”<sup>③</sup>,而是“靠他作品中过去和现在实际存在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无论作者本人,或是他同时代的人,在他那一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还不能自觉地感知和评价”<sup>④</sup>。具有世界瞩目的艺术成就和精神价值的俄罗斯经典文学正是这样的伟大作品,从整个文化背景客观地再现其形态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

---

<sup>①②③④</sup> М. М. Бахтин: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редакции «Нового мира»* (1970)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6.

意义。

文学的文化批评是价值阅读,是对审美批评的“品质阅读”的一种超越。艺术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综合文本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长处,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因此研究俄罗斯文学和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关系,对宗教文化史的背景知识要有深刻的理解。但是这种研究又不能陷入对宗教文化史的一味探求之中,而是要从文学自身的自足性和主体性出发。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作品,很容易迷失在对文学外部因素的追究和考察中,而忽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巴赫金在谈到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现象时,强调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正如英国学者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指出的那样,发掘文学中的社会信仰等文化因素,是为了文学能为理解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从艺术文本内部看到整个文化的大世界。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自足的艺术门类,对它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自身,这就是本论文的主要出发点。从文化史的角度解读文学经典,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要从文本自身出发,重视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化意义,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才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和合理的视角。通过对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过程使文学超出自身,而这种研究的最终结果又使文学回到自身,在更完善的合理的层面上展现其本真状态和精神价值。

—

“以文化的精神、上帝的精神领悟生活的真谛应该作很广泛的理解:宗教、道德、社会性、人类之爱、哲学、科学、艺术及其一切分支。所有这些都是圣灵之光。一切真正的创作都是坚定的、令人安慰的,具有一定的条理和结构。”<sup>①</sup>这是一个经历过祖国多舛命运的俄罗斯侨民作家扎伊采夫(Б. Зайцев)对于人类生活和创作的独特观点,代表着俄罗斯作家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态度。远离祖国的他异常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文化的神圣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俄罗斯的精神文化——从广

---

<sup>①</sup> Б. Зайцев: *Ден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7, Святая Русь*, М.: Изд.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3, стр. 355.

泛的意义上理解——是我们今天所赞颂的。它是一个全人类的领域,只是带有特殊的色调,就像使徒安德列是十二使徒之一,但是有自己独特的名字。”<sup>①</sup>

俄罗斯东正教精神和文学的联系由来已久,形成了复杂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东正教精神影响着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的风格特征、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探索以及作品的价值取向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就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内容、形式、形象、体裁、风格乃至情绪等。<sup>②</sup>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又促进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并丰富了其内涵。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基督形象和基督教主题上“体现了俄罗斯文化两个层面——原始的泛神论和基督教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不是削弱基督教形象,而是俄罗斯作家们对于西方启蒙和浪漫主义的一种回应,它赋予俄罗斯文学特有的力量和(思想)深度”。<sup>③</sup>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俄罗斯作家们明显地不满于东正教会的状况,同时他们意识到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精神上的脱离,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明显体验到一种使东正教人文科学化的愿望和倾向。同时,这些作家的创作因为历史背景和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或反叛等原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品格,并在他的宗教观和宗教立场上有所反映。

有一种说法认为,俄罗斯感受上帝和人的时代开始于果戈理和斯拉夫主义者。的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果戈理(Н. Гоголь)的创作中虽有明显的信仰色彩,但已不同于来自于拜占庭的基督教道路。这些知识分子的宗教探索精神和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并且二者常常相互融合,相互阐释。

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作家总是从东正教信仰的角度理解俄罗斯的精神文化,同时也构想着未来俄罗斯的理想面貌。“如果抛开罪恶的、悲剧的因素,应该看到俄罗斯那种更高绝对的品质——俄罗斯的神圣性,这时甚

---

① Б. Зайцев: *Ден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7, Святая Русь, М.: Изд.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2003, стр. 355.

② 任光宣《俄国文学与宗教》,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1页。

③ Е. Глазова — Корриган: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ка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у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Москва, 1997, стр. 356.

至会令人感到惊讶，我们会看到的正是没有癫狂、没有感情的冲动和病态。相反，是严肃的平静、纯洁和分寸感。在最终的境界中，俄罗斯灵魂是健康和谐的。”<sup>①</sup>可见俄罗斯作家也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表达自己的这种体验，进行着对俄罗斯精神的探索。

东正教的精神及其价值观念在同时具有虔敬心理和神秘思辨特征的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的意识中得到充分的渗透、体现和发展，这就决定了整个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的大体相似性，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特点来加以认识和研究。许多文学作品不但反映了俄罗斯社会风情、心理特征、宗教情绪等，也是作家们宗教体验和宗教情感的客观表达和延伸。“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果戈理的晚期创作是如此，悲剧性的莱蒙托夫（М. Лермонтов）是如此，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大诗人丘特切夫（Ф. Чютчев）是如此，深知人民宗教性的列斯科夫（Н. Лесков）是如此，格列勃·乌斯宾斯基（Г. Успенский）也是如此，他出色地描述了农民心理，他在自觉世界观上是非教徒，却有内在、深刻的宗教性。甚至‘俄国的歌德’，天才的普希金（А. Пушкин）也在自己某些深刻的诗作中表现了宗教的悲剧主义和热情的信仰。”<sup>②</sup> 在一些终生都在苦苦寻找上帝，具有超常的宗教敏感的作家，例如果戈理、托尔斯泰（Л. 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艺术创作中可以看到探索通往基督之路的心灵轨迹，同时在他们的宗教思考中又有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痛苦，这反映在作品主人公的宗教理念、价值观以及精神面貌上。

另一方面，在特殊的世界语境下，许多徘徊在宗教虔诚和人性觉醒之间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生存的意义和人类的使命、命运时思想意识中又存在着反上帝的因素，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恶魔形象是浪漫主义的个性意识所诞生的痛苦的灵魂。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对于与其他文化相异的俄罗斯宗教文化事实加以认识和剖析。

只是到了苏联时期，由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俄罗斯文学也不再公开探讨宗教问题。但是俄罗斯经典

① Е. Глазова – Корриган: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ка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у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Москва, 1997, стр. 356.

②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文学中的东正教传统即使是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以及苏联无神论文化宣传的时期之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代俄罗斯文学向宗教主题回归的序曲是 1966—1967 年,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之际米·布尔加科夫(М. Булгаков)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版。这部尘封了二十五年的作品的问世在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思想界如同催化剂,引发了一场宗教精神复归运动。

此后一些作家开始广泛涉及宗教题材,通过文学创作探讨宗教精神与信仰的问题。例如田德里亚科夫(В. Тендряков)的《圣像显灵》、瓦西里·贝科夫(В. Быков)的《百人长》等,之后艾特玛托夫(Ч. Айтматов)的《断头台》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尤其是在 1989 年罗斯受洗千纪念之后,掀起了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研究的热潮。不仅文学研究者发表大量有关方面的研究文章,出版论文集和专著,而且神学界人士也参加到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问题的讨论中来。

1991 年《文学问题》杂志的“编者按”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介绍和分析,文中指出:“我们仿佛在进行一种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众所周知,我们的改革不同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反教堂运动,它不是要变革教会,而是要消灭它。而我们的反宗教改革不只是对旧信仰的复归,而且是向那种真正宗教的复归。”这一时期俄罗斯白银时代新宗教思想家的著述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活领域则专门召开了研讨会,讨论共产主义信念和基督教共存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问题自然不复存在。

1993 年 6 月 7—12 日在彼得罗扎沃斯克大学举办了“18—20 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福音书文本”国际学术研讨会,自此每年以“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为主题的年会则强化了宗教和文化研究热潮。

1994 年 5 月 3—5 日在俄罗斯文学院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开拓了俄罗斯文学、文化与东正教关系方面最广泛的论题,分述了作家作品与东正教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思想家与东正教、中世纪与新时期文学中的东正教等问题,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文,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

1995 年复活节后一周,4 月 26 日召开的同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柳勃穆德罗夫(А. Любомудров)在 1996 年《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学作品中的东正教和宗教性的文章,系统列举了几年来俄罗

斯文学与东正教学术研究领域的诸多观点和结论，并做出了相应的评价，对于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研究中有关术语的使用做了区分和界定。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俄罗斯国内期刊上所登载的关于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方面的文章不胜枚举，研究几乎涉及俄罗斯所有经典作家及其创作，并对一些宗教思想家的基督教观念、俄罗斯文化中的重要事实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

20 世纪末出版的专著和文集也数量可观，例如 1994—1996 年间的论文集《基督教与俄罗斯文学》(一、二)，1997 年的《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俄国文学与宗教》、《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以及杜纳耶夫在 1996—1999 年间完成的 6 卷本神学文学研究专著《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等。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大多数观点强调俄罗斯文学的基督教本质，例如叶萨乌罗夫(И. Есауров)认为认识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教潜文本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德米特里耶夫(А. Димитриев)在文章中称“俄罗斯文化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深深植根于东正教之中”；洛斯卡亚－谢蒙(Лосская – Семон)在其名为《俄罗斯文学的宗教使命》的论文中视俄罗斯的作家为东正教的传教士和使徒；扎哈罗夫( В. Захаров)则认为近十一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都是基督教文学。

持不同意见的如奥斯特列佐娃(В. Остредкова)认为主题繁多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中并不存在教会和宗教的现实，新的世俗文化，首先是文学正是作为教会生活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布哈里金(П. Бухаркин)只承认俄罗斯文学中广义上的基督教文化，并且总结了研究世俗文学和教会以及教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时的几个主要角度：两个体系的相互作用以及文学语言的相关性；教会与世俗艺术的接受问题；对作为俄罗斯语言艺术的一个特殊部分的教会教诲性文学的研究；宗教性世俗文学的研究；东正教会期刊史等等。

总体而论，俄罗斯国内对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视野广泛而且涉及的文化事实比较深入，例如像《普希金与共济会会员》、《18 世纪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共济会》、《拉吉舍夫与共济会组织》、《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创作中的圣瓦尔瓦拉崇拜》、《18 世纪俄罗斯的共济会诗歌》等等都从某一种文化背景下对有关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但俄罗斯国内对于宗教和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涵盖在对东正教与文化

的大主题研究之下的，很少有人把文学作为一个和宗教相互作用的自足的整体体系来认识。尤其是杜纳耶夫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堪称该研究领域最为工程浩大的，也最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但由于其东正教神学家的布道色彩过于浓烈，其着眼点很明显在于宣传东正教教义的精神，而不在于文学作品本身，以致很难被各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

可见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俄罗斯文学和东正教的关系都不太适用，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是从宗教思维对文学创作进行思考的，是“把文学基督教化了”<sup>①</sup>。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个自在独立的人文文化形态，它的价值远不是由其宗教性和基督教精神决定的，尤其是对于外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来说，从宗教性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总体精神价值和艺术特征，就要站在一个客观而开阔的视角，考察在东正教文化和观念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文学与东正教精神有关的内容和形式上的一些特征。

同样的一种文化，在本民族的作家和研究者眼中和从其他民族的立场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巴赫金就批评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就应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因为那样即使理解了也只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这样我们可以对所研究的东西保持外位性，即时间上、空间上和文化上的外位性，这对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有这种外位性才能看清和理解它真正的面貌。”<sup>②</sup>一种文化只有在具有不同文化类型的人眼中才能得到较为充分和深刻的揭示，只有在两种文化的对话和交锋中，才会显示出一种文化独特的底蕴。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的研究者来看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的文学现象的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中国的视角，展现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文学文本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存在形态。

俄国的宗教文化是一种复杂而又极富典型意义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方面，长期的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现实又表明，俄罗斯民族已形成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系统的基督教意识和基督教观念，并且这种基督教观念

① 任光宣《当前俄罗斯对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一瞥》，《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М. М. Бахтин: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редакции «Нового мира»* (1970) // Литературно –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6.

在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古罗斯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固定下来的多神教崇拜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在民间保存下来，加之许多民间宗教诸如萨满教观念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势力。宗教精神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是俄罗斯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

俄罗斯文学中所体现的宗教因素不但有东正教的，而且受到天主教、新教以及远古多神教、萨满教、民间宗教崇拜的影响，这是俄罗斯文学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也是这一课题的价值所在。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其中以黑龙江大学的金亚娜教授和北京大学的任光宣教授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早在 1994 年，金教授在《俄国文化研究论集》(1994, 哈尔滨)中的有关著述展示了我国俄罗斯文化研究的最早成果，并在另一部最新专著《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2003, 北京)中，从造成俄罗斯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及自然和地理因素的诸多角度对其传统宗教文化观念和精神特征做了详尽的论述和分析，金教授对于俄国宗教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其宗教哲学高度和历史人类学的广度，从本源上探讨俄罗斯民族宗教文化本质和有关俄罗斯宗教哲学观念的文化内涵；任光宣教授在 1995 年出版的《俄国文学与宗教》(1995, 北京)一书广泛论及了俄罗斯的古代宗教和民间宗教以及宗教文学，并对 19 世纪世俗文学中的宗教思想进行了研究。

此后宗教文化视角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些年轻学者纷纷把东正教文化精神与俄罗斯文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或科研立项，并出版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著作，其中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研究居多，例如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1997, 长沙)从俄国文化精神的几个典型方面着眼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化价值；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2002, 北京)运用了“形式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细读文本，从陀氏小说中的字、词、句中探究其背后深层的民族宗教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2003, 北京)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解读了作家创作的诗学特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等等。我国哲学领域对俄罗斯文学现象的宗教文化阐释也有所增多，像何怀宏的《道德 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1999,

北京)从宗教思想的角度分析了陀氏小说中的道德哲学体系;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2003,北京)中对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宗教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是国内从基督教角度观照文学现象的代表。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对俄罗斯国内宗教与文化问题的研究状况也一直给予充分的关注,并向中国学界做了译介和评价,如任光宣教授的《当前俄罗斯对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一瞥》(1998,《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管窥》(2002,《外国文学研究》)以及孙湘瑞的《近10年来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综述》(1997,《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此外文学研究期刊登载的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文化阐释性文章也有所增多,如金亚娜教授的《俄罗斯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文化背景研究之一》(2001,《外语学刊》),任光宣教授的《普希金与宗教》(1999,《国外文学》),汪剑钊的《俄国象征派诗歌与宗教精神》(1996,《外国文学》)等等。这些研究可谓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文学现象的独特视角。但要对东正教精神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进行系统的专门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存在着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难题。

## 二

众所周知,天主教和东正教长期对立,相互斥为异端,主要是基于一些教义和教礼上的分歧,例如,东正教会反对天主教会对于尼西亚信经“三位一体”说法的修改:它认为天主教把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是对基督教原来的精神的违背,破坏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性,<sup>①</sup>因此东正教一贯强调圣灵的神圣性;另外,东正教反对天主教关于天堂和地狱之间存在涤罪的炼狱的说法和买卖赎罪券的教堂礼仪;东正教比西方的天主教更加注重普遍的修道生活,从公元4世纪起,修道就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教方式遍及东方的基督教世界。隐修士的

<sup>①</sup>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禁欲生活是东正教众的理想和对基督虔敬的最普遍的表达方式,所以一直以来,东正教世界不但有为数众多的修道院,而且随处可见在山洞和沙漠等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隐修士,而自我牺牲精神是东正教圣徒所特有的一种禁欲主义传统;另外,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认为得救不是个体的行为,教徒们有着极强的群体意识,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也译聚议性、普世性、团结性或集聚性)正是从东正教传统而来;基督崇拜是东正教徒精神生活的核心,基督救赎世界所受的苦难和复活的神迹对东正教徒来说具有特殊的亲切感;与之相伴的还有普遍的圣像崇拜,在俄罗斯,由于民众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信徒们都相信圣像会显灵,并能够创造奇迹;东正教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圣母崇拜。神人基督来自圣母的圣化,圣子基督因圣母而认识人类,她是上帝道成肉身的工具,所以说她是人类之母。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圣母崇拜还与大地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基督教精神与古老的多神教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与东正教这些观念相关,它强烈的神秘主义也成为俄罗斯人的宗教社会生活以及宗教哲学观念的突出特征。

从形式上看,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另一个不同在于某种静观性和非此世性,这是有别于西方基督教的实践性的本质特征。它一般不用塑像,而是代之以圣像,所以圣像在俄罗斯人的宗教生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和神奇力量。当他们向圣像祈祷时,祈祷词的内容却常常像是对家神在说话,人们会乞求东正教的圣徒们保佑。东方基督教(东正教)把基督最爱的门徒、被圣母收为义子的“爱的使徒”约翰当做第一使徒;而西方基督教则具有另外两个最高使徒的精神——使徒彼得的精神(在天主教中)和使徒保罗的精神(在新教中)。约翰的基督教所追求的是贴在老师的胸前,而彼得的基督教所关心的则是两把刀和建立教会。<sup>①</sup>西方的基督教是能动的基督教,而东方基督教是静观的基督教。因此对于东方基督教的僧侣来说,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祈祷。基督教世界中常用马大和马利亚对基督的爱的两种表达方式来比喻东西方基督教相区别的特征。马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而她的姐姐马大却为服侍耶稣而忙碌具体事务。耶稣却责备马大不该为许多事思虑烦忧,说马利亚所

---

<sup>①</sup> [俄]谢·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9页。

做的才是唯一必需的一件事。<sup>①</sup> 显然，马利亚的代表东正教信仰的理念，而马大的侍主行为正是天主教方式的象征。东正教的心灵所追求的是灵性之美，它的道德理想更像是一种宗教审美的理想，而不能简单地用善与恶的划分来概括和理解。由于东正教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正适合了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极端主义和救世主义，因此在接受了基督教的俄罗斯渐渐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宗教使命感。

接受基督教后的俄罗斯在其宗教道路的发展中与天主教和新教世界不同，在罗马教会发生分裂，俄罗斯继承了拜占庭东正教以后，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神学理论体系，这和东正教不重理性思辨，崇尚灵性修炼的特点有关。其实，在俄罗斯，对东正教思想观念的探索是由教会神学家、世俗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的，因此它同时也表现为一些宗教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广泛、零散但却深刻的神学主题和宗教观念。自接受基督教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启示录式的思维方式，与民族固有的宗教虔敬感相契合，形成种种缘于期待救赎的哲学思考，体现在富于民族使命感和对生存意义的神秘感悟的知识分子笔下，形成独特的世界观体系。也就是说，俄罗斯作家为东正教哲学提供了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命题，以其艺术创作发展了宗教道德思想体系，深化和拓展了东正教的精神价值，体现了独特的宗教道德理想，如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维·伊万诺夫(Вяч. Иванов)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思想和哲学观点；有许多人是集宗教哲学家或诗人作家于一身的，如维·伊万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В. Соловьёв)等，这缘于，同时也证明了俄罗斯的东正教和文学所关注的问题的一致性或相似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出现了宗教和文学创作的新浪潮，一些具有宗教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宗教界人士交流频繁，共同参与对于宗教精神的探索。同时，俄罗斯思想中固有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传统，俄国的大多数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承认文学和宗教的精神融合，弗兰克(С. Франк)说：“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中表达出来的。”<sup>②</sup> 像别尔

<sup>①</sup>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42节。

<sup>②</sup>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索洛维约夫、弗兰克、舍斯托夫(Л. Шестов)、谢·布尔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等无不认为文学是俄罗斯精神的真正体现，并不断从不同的理论观念出发对一些作家及作品宗教哲学意义的阐释。这些宗教哲学思想家强调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人身上的神性，强调东正教在其中的决定性意义。俄罗斯文学与哲学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是与俄罗斯世界观的精神性相关联的，因为二者的目的都“不在于纯理论上的、不偏不倚地认识世界，而总是对生命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解说”<sup>①</sup>。可以说俄罗斯文学在渴望救赎，探索对彼岸生活及生命终极意义方面和东正教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和具体描述也将成为一个对于认识俄罗斯文化特性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

为了不至于在论述中陷入对东正教精神本质和有别于西方基督教的特征的不断追述，下面分层次简要介绍一下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大致情况，以便在以后的论述中可以直接深入文本，并且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正文中的有关思想和表述。

首先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即民族性格和潜意识的方面介绍俄罗斯接受东正教信仰、传播东正教观念和发展东正教理论学说的基础和始因。俄罗斯的性格和文化是一系列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辩证统一，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只有选取一个客观全面的视角才能真正达到对其本质的理解。在形成独特的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对东正教的接受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一历史的事实和其他的历史因素如多神教信仰、历史和地理因素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互渗透和制约，造就和促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应该肯定的是，东正教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形成和扩展，是一个后宗教现象，换言之，基督教是诸民族一地域的民俗性宗教的样式基本成形之后形成并扩展的。因此，基督教与民俗性宗教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基督教在不同民族一地域与不同的民俗性宗教的遭遇，会影响到民族一地域的基督教的历史样式。”<sup>②</sup> 因此探讨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区别于西方天主教和新教的本质

①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 [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特征及其原因,对于认识俄罗斯精神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的东正教观念是在继承拜占庭东正教传统的基础上,和俄罗斯民族文化相融合,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逐渐形成的精神价值体系。在俄罗斯宗教信仰复杂的变迁过程中,东正教精神最终在民族性格中沉积下来,成为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影响着俄罗斯作家们的价值观念和创作思想的取向,而这种特殊的人文文化精神通过富有极高艺术成就和世界声誉的俄罗斯文学得到充分的体现。俄罗斯作家们不但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展现了一种宗教精神,也在其中融入自己的宗教情感、宗教理想以及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类生存目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思考。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和理解它的精髓,挖掘出它的灵魂,就不能脱离开宗教,尤其是东正教的视角。

东正教的两个基本特点是“非此世性”和神秘的直觉。俄罗斯人素有一种对于绝对者以及神秘灵感的永恒渴求,所以对基督教教义虽没有深入的理解和领会,但基督教对至高存在者的神秘感觉给了俄罗斯灵魂以无限的安慰。虔信基督的俄罗斯人认为,对奥秘加以思辨是不好的,应该对其沉思默想,让它发出光明,而信仰的人就沐浴在这种光明之中。<sup>①</sup>“俄罗斯人不善于建构系统的思想,因为他们觉得系统是狭窄的。”<sup>②</sup>而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少规范的一支,它较少关注概念演绎,这一点正有机地契合了俄罗斯的灵魂。“在拜占庭的宗教礼仪中存在着某种与俄罗斯人的审美期待相互呼应的东西。”<sup>③</sup>“是洗礼、教理、礼仪和圣像强有力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并将此精神引入业已存在的基督教价值观世界之中。俄罗斯的儿童是在朗读诗篇中学会阅读的,是《圣经》和礼仪锻造了民族语言并由此产生了斯拉夫语:民族的、成熟的最重要的反思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基督教的学校中,以便接受拜占庭正教的伟大遗产。”<sup>④</sup>可见教会学校对俄罗斯民众的启蒙教育是形成民众信仰方式的强大基础。对于俄罗斯民间东正教信仰的状况,赫克指出:“在俄国的偏僻地区,老百姓对宗教仪式用语的意义完全不懂,更不用说主祷文了,而主祷文又常常在重复时

① [俄]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②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③ 转引自赵桂莲《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④ [俄]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7页。